

论《红字》前言《海关》一文的创作目的

阙诗涛

(厦门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霍桑的名著《红字》出版后曾引起轰动,这与作者为该书精心创作的前言——《海关》的宣传效果是不可分割。试从《红字》创作的政治历史背景,《红字》出版时的商业背景以及《红字》主题可能引发的道德责任三方面入手分析该前言,以揭示出霍桑创作前言的真实目的,是想以政治爆料为噱头,吸引大批读者,提升《红字》销量的同时,通过塑造一个“编辑者”的叙述者形象,巧妙地规避了《红字》主题可能引发的道德责任,从而达到商业文学和艺术文学的完美平衡。

关键词: 红字;霍桑;海关;商业文学;叙事策略

Hawthorne's Real Intention of Writing *The Custom-House*

QUE Shi-t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carlet Letter* not only caused a sensation, but also created a landmark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The huge success was largely due to *The Custom-House* —— a deliberately written introduction of the novel. This essay researches on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the novel's creation, the commercial background of its publication and the moral obligation attached to its theme, so as to reveal Hawthorne's real intention of writing *The Custom-House*, that is to make use of political exposure to attract a large number of readers and ingeniously evade the moral obligation attached to the novel's theme by creating a narrator with the image of an "editor", thus striking a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popular success and literary quality.

Key words: *The Scarlet Letter*; Hawthorne; *The Custom-House*; commercial literature; narrative strategy

1850年霍桑出版了其著名小说《红字》。该书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红字》一书有着一篇长篇叙事前言——《海关》。这篇前言的特殊之处在于:首先,它的篇幅很长,与全书的篇幅相比似乎不成比例,可以独立成为一篇完整的随笔。其次,它的内容与整个故事的主题关系不大。作者在《海关》前言中是以他的故乡萨勒姆镇为写作背景,以本人在海关任公职的三年坎坷经历为题材,对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加以叙述。而《红字》则是以作者虚构的 17

世纪发生在波士顿的一桩婚外情作为创作主题。即使读者脱离前言,直接阅读《红字》,对小说故事情节的了解和欣赏也并无大碍。并且前言与小说的写作风格迥异,前者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而后者则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麦克肖恩指出:“《海关》在写作风格上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称得上是一个戏谑、讽刺、直陈式叙事和严肃哲学思辨的奇异结合体”^[1]。作者给《红字》写这样一篇前言,并在第二版序言中强调要“一字不动把他的前言再次印出”^[2],这足以看出前言对于全书的重要

性。文学批评界对这篇前言重要性的认识也经历过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早期的文学评论家更趋于关注《海关》前言在结构上的不连贯性,以及它和《红字》之间疏松的关系。沃伦就直言不讳的指出,《海关》是“一篇与《红字》这部杰作极不相称的怪异的前言”^[3]。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对《海关》前言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评论家们开始着力发掘《海关》与《红字》之间潜在的联系。包括麦克肖恩在内的多位学者指出,这两篇文章在主题上有许多联系。《海关》中所蕴含的“疏离感,负罪感和衰落”^[1]的主题与《红字》的主题不谋而合。而读者只有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解读《海关》前言,才能对它的重要性有更为充分的理解。从表面上看,前言只是一篇带有政治色彩的作者的自传。实际上它发挥的作用是为《红字》一书招徕大量的读者,而这些读者通过对前言的阅读,能给作品一个较好的评价。这一切正是作者创作前言的真实目的。

一、《红字》写作的政治背景与前言《海关》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逐渐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民主党与辉格党为争夺总统宝座展开激烈的争斗。每伴随着政权的更替,执政党就要在公职人员进行一番大清洗,以排挤异己安插亲信的方式,对竞选中的有功之臣进行犒劳。作为一位“忠实的民主派”^{[2]11},1846年处在经济窘境中的霍桑得到了政界中民主党要朋友的帮助,在海关谋得一份公职,被总统任命为萨勒姆和贝弗利区的海关验货官及萨勒姆港税务稽查员,这份年薪1200美元的公职大大缓解了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父亲的霍桑经济上的困难。但霍桑不久便成为“政党分赃制”的牺牲品,1848年总统换届,辉格党在竞选中获胜后,便着手在各地清洗民主党公职人员,霍桑也因此受牵连而被解除了公职。这一政治事件对霍桑的打击是巨大的,它不仅使他思想上陷入极度烦恼之中,而且还断了他一家的生计,使霍桑的生活陷入了绝境。在这次事件中,他海关的辉格党同事表现恶劣,令他感到非常沮丧。霍桑在与朗费罗的书信中曾表达出他对辉格党同事的憎恶之情:“我或许会选择一

品,将怨恨的毒液注入他的心中,这至少会令他在大众露出胜利的微笑前痛不欲生”^{[4]263}。因此,随后他借出版《红字》的机会在前言中讲述自己在海关的那段经历,为自己政治上被“砍头”成为牺牲品进行申辩,并且泄泄私怨,亦无可厚非。曹亚军在对《海关》前言进行政治解读时分析了霍桑在前言中对海关这一“冷漠的政治机器”,海关中昏聩麻木的职员以及“自己的男系祖先——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创建者们”^[5]的三个层次的批判,揭示出霍桑写作《海关》的政治目的,即抒发他对美国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政党政治的满腔愤怒。但应该强调的是,这绝不是霍桑写《海关》这篇前言的真实目的。正如霍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写到:“至于敌意,或任何类别的恶意,无论属公属私,或者涉及政治与否,他全然没有此等动机”^{[2]1}。从当时政治背景的角度分析,这动机不能说没有,但绝不是他的全部动机。而从历史角度分析,霍桑写《海关》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目的。

霍桑被解职后,其家庭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一家四口人生活陷入绝境,“甚至达到买不起照明蜡烛和全家挨饿之程度”^{[6]24}。斯图亚特在其所著霍桑传记中也特别记载了当时霍桑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对于霍桑来说,经济压力不是什么新鲜之事,但现在却是前所未有的窘迫。他一定是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重新静静地坐下来,思考重新以创作谋生”^[7]。在丧失稳定经济来源,并因此拥有大量自主支配时间的情况下,文学创作成为霍桑维持生计的不二选择,而创作成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对霍桑一家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先前发表短篇小说时“每篇仅能获得区区25美元”^[8]的经验,霍桑在出版商朋友弗尔兹的鼓励下,将目标对准了稿酬比较多的长篇小说,定下心来创作《红字》。曾自嘲是“美国最不出名的文人”的霍桑此时却不得不面对《红字》必须顺利出版并获得成功,尤其是销量上成功的压力。霍桑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精心创作出《海关》这篇前言的,目的就是竭尽所能地为《红字》的顺利出版和畅销铺平道路。他在前言中首先和读者搞好关系,博得读者的同情。然后通过叙述自己在海关的经历,引发读者的兴趣。同时,他虚构了一个《红字》故事的来源,并把

它夹在自己的自传性文字中加以叙述,目的是要让读者相信《红字》故事的真实性。他还努力塑造出一个《海关》和《红字》共同的可靠叙述者形象,并“把自己置于这本故事集中最长一篇故事的编辑位置上”^{[2]2},以规避可能发生的道德责任的追究。这一切便是霍桑创作前言真实的动机和目的。

二、《红字》出版的商业背景与前言的轰动效应

在定义经典文学作品时,李刚和谢燕红指出:“能够将文人的精英意识和情感与大众文化的普遍要求相契合,在最可能大的范围和最可能长的时间内起到正面影响的作品”^[9]才能称为真正的经典之作,而《红字》的创作过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红字》出版的年代美国正处在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期。美国文坛也受到商业浪潮的冲击,文学市场化的特征日益突出,文学分级、读者分层的现象非常普遍。当时的文学市场基本上是由女作家占有。这些女作家的创作特点是“违背道德规范,过分暴露隐私,在大庭广众下渲染个人秘密,家庭琐事,医学奇闻等”^[10]。尽管她们的作品内容格调低下,却拥有着众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据莫特的统计,1850年至1855年间出产的美国小说,只有八部作品总销量超过225 000册,这其中除了霍桑的《红字》和《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以及梅尔维尔的《白鲸》以外,其余五部作品均由女性作家完成。而且与霍桑和梅尔维尔的作品需要长达几十年时间积累销量不同的是,这些女作家的作品销量增长速度惊人^[11],她们的作品畅销程度“均能以十万计的销量来衡量”^{[12]304}。她们有着丰厚的创作收入,而类似霍桑这样没什么名气的落魄文人只能在美国知识分子中争取到一小部分读者,稿酬自然相形见绌。霍桑对这种现象耿耿于怀,他在给自己出版商朋友提克诺的信中曾愤怒的写道:“当今美国完全被一群他妈的胡写乱道的女人所控制。如果公众趣味被这些垃圾所占据,我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了——即使成功我也会感到羞愧”^{[12]304}。

然而,面对这些女流之辈吃香喝辣,霍桑难免也会垂涎。他承认自己非常羡慕她们,并赞扬这些

女作家能够“挣脱道德礼节的羁绊”^{[12]308},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与其把霍桑这些前后矛盾的言辞看作是他对当时文学市场的一种悖论性判断,倒不如认为这是当时的商业背景所造成霍桑分裂人格的一种体现。方文开准确地揣摩出了霍桑当时的心态:“为了保证创作的市场效应,霍桑就不得不在‘艺术’和‘养家糊口’之间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追求艺术而不违背自己的‘心灵’与‘良心’,为了糊口屈就大众审美的‘期待视野’,为了推销自我去追逐最大可能的经济收益而不断送自己长期以来的艺术追求,霍桑在极其痛苦之中选择了‘艺术’与‘文学市场’的中间路线”^{[16]29}。《红字》的创作过程也因此成为了一次融合了艺术文学和商业文学的创作实践。霍桑在招徕读者和与读者搞好关系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仿效女作家“挣脱道德礼节的羁绊”,大胆地为《红字》确定了一个婚外情的主题,而且还另加一篇爆政治猛料的《海关》,以吸引对政治感兴趣的那部分读者,引发另一种轰动。在前言中,霍桑借叙述自己在海关任公务员的那一段经历,把官场上的阴暗面和政治斗争的内幕进行了彻底的曝光。在当时,对政治感兴趣以及关注霍桑成为政治及政党斗争牺牲品的读者甚至比对《红字》故事本身感兴趣的读者还要多。他们都冲着《海关》来买《红字》这本书,于是也在不自觉中加入了《红字》读者的行列。由于这些人的加入,《红字》不仅畅销,甚至引起轰动。正如霍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写道:“令作者大为诧异,又颇感可笑,他写的那篇有关公务生活的文章——《红字》的前言竟在他周围的有识之士中激起了这般空前的狂风怒涛。确实,即使他将那幢海关大厦烧毁,再把最后一根还在冒烟的木料浸到一位据说他深恶痛绝,但深孚众望的大人物的血泊中,引起的反响可能也不至于如此激烈”^[21]。从霍桑这一描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字》一书出版后所引起的巨大轰动,而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无疑来自前言《海关》。

这篇随笔在当时极为流行,读者对它更是偏爱有加。这一切霍桑是早有预料的,因为这本来就是霍桑写这篇前言的目的之一。作者说自己大为诧异显然是不实之词,而颇感兴味倒是在情理之中。招徕读者只是霍桑目的的一部分,关键还要获

得读者的好评。当时书要保持畅销,读者的口碑是很重要的。于是,霍桑在前言中尽其所能地讨好读者,博得读者好感。这种与读者“套近乎”的手法在前言中多处可见。霍桑在前言的开篇就这样写道:“事情说来有点蹊跷,尽管我不喜欢坐在炉边与亲朋好友谈论太多关于我自己的生平逸事,但是我一生中竟有过两次想把自己的生平经历公之于众的冲动”。他接着写道:“在作者把书稿公之于众时,他与之交谈的不是众多把他的书弃之一边的人,或是不从触摸该书的人,而是为数不多的知音读者,他们甚至比他的大多数同学或终生好友更了解他”^{[2]1}。这种与读者推心置腹的姿态不仅能为霍桑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情和理解,同时也在广大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一位值得信赖的叙述者形象,为接下来霍桑巧妙地处理《红字》小说棘手的婚外情主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红字》的道德责任与前言的叙事策略

霍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目光敏锐,在《红字》创作的过程中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婚外情作为全书的主题进行创作,对霍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的美国还处于十分保守的社会背景下,以婚外情来作为一部作品的主题在道德层面上是备受争议的。小说发行之初,保守的新教圣公会主教科克斯公开质疑霍桑选择《红字》主题的品味,并抨击《红字》是“精心设计的淫荡”^[3]之作就是有力的证明。然而以婚外情作为主题又最能招徕读者。要正确处理这对矛盾的确不是件易事。在创作《红字》的过程中,霍桑一直为如何处理小说主题感到担心。他在给出版商弗尔兹的信中这样写道:“《红字》的主题写起来很棘手,但在我看来,我处理这一主题的方式应该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引起读者的反感。那篇题为《海关》的文章是全书的前言,因此请你先看它”^{[4]305}。在前言中,霍桑把原本虚构的《红字》故事的来源夹在自己真实的身世中加以叙述,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同时向读者强调一点:《红字》故事并不是他的原创。他要求读者“应该牢牢记住,那个故事里的主要事实是以稽查官皮尤先生的文件为依据或佐证的。

原始文件及那个红布做的字母——一件最引起人们好奇的遗物——仍然由我保管,凡对这个记述感兴趣的,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些东西的人,随时都可前来观看”^{[2]28},而他只是充当一个编辑的角色。正如潘志明所分析的那样,“《红字》的叙事是从一个不愿承担叙事责任的叙事人的视角展开的”。霍桑在前言《海关》中就已经着手为自己准备承担故事道德责任的替罪羊人选,“把自己应当承担的叙事责任分派给了小说中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并通过他们的视角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自己则置身于“小说人物叙事的传声筒、代言人”^[14]这样相对安全的位置。作者在《海关》中为整部小说定下了“隔岸观火”式的叙事基调,摆脱了《红字》婚外情主题可能引发道德责任的危险。

当然,霍桑在写作过程中并不是自始至终一味消极地推脱《红字》一书可能引发的道德责任。实际上,他在前言《海关》的写作过程中就已经开始积极地塑造一位《海关》和《红字》共同的叙述者形象,并以此巧妙地规避了道德责任。前言《海关》在内容上与《红字》的唯一联系就是稽查官皮尤所遗留下来的红字和有关海斯特的生平概要,而这一看似牵强的“巧合”恰恰常成为评论家们诟病前言《海关》时的“把柄”。霍桑当然不会没有意识到此处“破绽”——这只不过是玩的一个“小把戏”。正如道森所指出的:“这种充满揶揄意味的假相定下了全书叙事口吻的基调。这种叙事口吻不仅介绍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有关相对史实和绝对真实间存在的问题,而这也是整部小说主题素材中至关重要的一环”^[15]。在前言中,霍桑早早地就在读者心目中塑造出一位政治上被“砍了头”的稽查官叙述者形象。他生性复杂,叙事时常常于戏谑讽刺中夹杂着思辨。他在《海关》中的叙事口吻与《红字》中“时而恼怒抱怨,时而自我怀疑”^[15]的叙事声音相互呼应。而叙事者自身内部矛盾情绪在叙事过程中自然或不自然的流露则为《红字》故事在“道德判断上的双重性”^[15]做了有力的铺垫。有了对叙述者叙事风格的了解,读者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红字》叙述过程中针对海斯特婚外情主题所表现出的复杂心情了。如果说霍桑在《海关》开篇与读者“套近乎”是为了树立一个可靠

的叙述者形象的话,那么这位可靠的叙述者处理《红字》棘手主题时的复杂心情就可以被解读成是作者本人心情的映射。这也就在无形中减轻了作者以婚外情作为主题的道德责任。事实也证明这一叙事策略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红字》顺利出版,并获得读者的好评。对于以创作来谋生的霍桑来说,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而其中前言的作用功不可没。

四、结束语

《海关》——《红字》前言不愧是霍桑的一篇杰作。在政治写作的幌子下,前言在商业文学和艺术文学之间找到了平衡,并发挥到极致,这就是霍桑创作前言的真实目的。在文学史上,这是一大创新。连霍桑本人都以为“他不可能以更亲切更良好的心绪重新撰写,并就其能力而言,也无望写得更生动更真实”^[2]。的确,在这一点上,至今还没人能超越他。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变迁,前言对整本书的意义已渐淡去,它的使命早已完成。现在即使把前言全部略去,亦无损于读者对《红字》的阅读,更无损于此书的价值。二者放在一起,由于风格上的差异,读起来反倒觉得有些怪异。然而,历代出版商无一例外地把二者合并出版。这一来是为了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部名著的创作背景,二来也是为了表达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崇高敬意。

参考文献:

- [1] MACSHANE F. The house of the dead: Hawthorne's Custom House and The Scarlet Letter [J].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1962 35 93-101.
- [2] 霍桑·纳撒尼尔. 红字[M]. 姚乃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 [3] WARREN A. Introduction[G] // CLARK H H. Nathaniel Hawthorne,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 [4] HAWTHORNE N. The letters, 1843—1853, 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M].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85.
- [5] 曹亚军. 霍桑及其《红字》之二:“海关”及通奸罪的政治解读[J]. 深圳大学学报, 1999 ,16(2) :65-72.
- [6] 方文开. 人性·自然·精神家园——霍桑及其现代性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 [7] STEWART R. Nathaniel Hawthorne: a biography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
- [8] MCMAHON T. Authors and artists for young adults Vol 18 [M]. Michigan :Cengage Gale ,1996.
- [9] 李刚,谢燕红. 浅谈散文的“媚俗”和大众化[J]. 莆田学院学报,2003 ,10(2) :87-90.
- [10] WALLACE J D. Hawthorne and the scribbling women reconsidered[J]. American Literature ,1990 ,62 201-222.
- [11] MOTT F L. Golden multitudes: the story of best sell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 Macmillan ,1947.
- [12] HAWTHORNE N. The letters, 1853—1856, 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M].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62.
- [13] COXE A C. The nauseous amour of a puritan pastor [G] // BRADLEY S. The Scarlet Letter: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1978.
- [14] 潘志明. 含混:《红字》的内在叙事策略[J]. 外国文学,2007(2) :36-46.
- [15] DEUSEN M V. Narrative tone in The Custom House and The Scarlet Letter [J].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966 21 :61-71.

[责任编辑 刘福铸]